

# 親歷 美國逆轉

金焱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用歷史的、國際的視野去分析和理解現實生活中的事件往往是困難的，這導致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常常是局部的、孤立的、片面的。相反，如果用全球視野和動態發展的方法來觀察現實，很多問題就很可能從難以理解變成豁然開朗。金焱在這方面有努力的嘗試，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這本比較全面反映美國的新著。

——金中夏 IMF 中國執行董事

儘管我們一直自以為對美國的了解多過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但中國數以萬計的美國研究者卻極少有機會或者有意願去扎根美國大眾、深入理解美國社會。金焱憑着她卓越的溝通能力和超人的勤奮，全方位探索美國社會各個階層對中美經濟交往的多元認知。如果我們能早些擁有這樣一本書，或許我們可以避免或者減少這一年多來我們對於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誤判。

——屠新泉 對外經貿大學 WTO 研究院院長

在美中關係及美國大國權力何處去的關鍵節點，金焱提供了對當今美國政治和經濟動態的獨到解讀。對美國及其他區域在政策和經濟、商業上的引領因素，她都有近距離的接觸；對美中兩國各自運轉的體系，她都有深刻的理解，這些賦予了她少有的優越視角，也使她的新著成為認識這個時代那些最重要議題的一本不容錯過的讀物。

——司馬安洲 (Andrew Small)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跨大西洋高級研究員

金焱以旅居美國期間的細緻觀察，廣泛的交流，縝密的思考，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能源等方方面面抽絲剝繭，娓娓道來，形成自己的洞察，為我們理解當前的美國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視角。該書覆蓋面廣，會讓不同的讀者群體找到很好的參考。

——陳黎明 IBM 大中華區董事長

2018 年，中美關係進入了全新的一個節點，儘管特朗普的政策很難預測，但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洪流。面對新的變化和越來越不確定的趨勢，我們應該更好的認識真實、全面的美國。金焱在美國工作了六年，也是近距離觀察了六年，無論是宏觀的政府決策層面，還是微觀的具體商業變化，都進行了細緻深刻的獨立思考。這是一本重新理解美國的書，非常適合今天我們重新認識美國。

——王煜全 海銀資本創始合夥人

美國在變，變得讓人不可思議！美國國內政治在變，政黨爭鬥方式眼花繚亂，使人看不出頭緒；美國國際政治也在變，變得四處出擊，敵我不分，毫無章法，使盟友和對手都不知所措。美國之變攪動了全球，這是特朗普總統個人風格所致呢，還是美國政治、社會和經濟演進的必然結果呢？金焱以其駐美記者的社交優勢和專業素養，以及女性獨特的細膩，全方位觀察描述了美國之變，有助於我們理解美國之變的內涵和主因，值得一讀！

——徐林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

近年來，美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其原因雖有跡可循，但很多時候卻令人大惑不解。尤其是當前美國各種矛盾交織、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的歷史階段，美國究竟何去何從，這不僅關乎美國國家及其人民的未來和福祉，也將直接關乎着全球以及世界人民的進步和發展。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審視當今美國所發生的一切，如何研判其帶給全球的諸多不確定性，又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應對之策，金焱這本新著無疑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和答案，非常值得一讀！

——李昌曉 西南大學教授 / 博士生導師

我很高興六年前派金焱去美國做記者，我更欣慰的看到，六年裡她專業能力的上升和變化，我很樂意向大家推薦她這本新著，觀察細緻，思考深入，文筆流暢，不容錯過。

——王波明 《財經》雜誌總編輯

# 目 錄

|                |    |
|----------------|----|
| 推薦序一 朱民 .....  | 5  |
| 推薦序二 馬蔚華 ..... | 8  |
| 推薦序三 何帆 .....  | 15 |
| 自序 .....       | 20 |

## 第一章 特朗普崛起

|                     |     |
|---------------------|-----|
| 一黨治國 .....          | 003 |
| 政治 + 正確 .....       | 015 |
| 特朗普的擁躉 .....        | 022 |
| 對手和敵人，反對者和抵抗者 ..... | 043 |

## 第二章 低增長的新常態

|                     |     |
|---------------------|-----|
| 進入後 QE 時代 .....     | 065 |
| 能源獨立的來臨 .....       | 085 |
| 房地產的十年景氣循環 .....    | 116 |
| 充分就業的迷題 .....       | 130 |
| 坐等通脹 .....          | 140 |
| 4% 的增長，看似一步之遙 ..... | 151 |

### 第三章 押注製造業反轉

|                     |     |
|---------------------|-----|
| 底特律起死回生 .....       | 169 |
| 「翻新」美國製造 南卡樣本 ..... | 198 |
| 「美國製造」的神話 .....     | 215 |
| 製造業新賽局 .....        | 225 |

### 第四章 鏽帶上的真實美國

|                 |     |
|-----------------|-----|
| 鏽帶的自我救贖 .....   | 239 |
| 復興版圖 .....      | 243 |
| 怎樣復蘇？ .....     | 247 |
| 水牛城浴火新生 .....   | 253 |
| 尼亞加拉瀑布的沉降 ..... | 264 |
| 謀殺之都已無人可殺 ..... | 273 |

### 第五章 中美關係轉向

|               |     |
|---------------|-----|
| 螺旋向下 .....    | 287 |
| 外交低潮 .....    | 291 |
| 網絡與安全 .....   | 295 |
| 困難的對話 .....   | 302 |
| 衰落與崛起 .....   | 307 |
| 發酵的不滿 .....   | 314 |
| 冷戰從經濟開始 ..... | 319 |
| 總統班底 .....    | 328 |
| 地緣政治的戰場 ..... | 337 |

## 第六章 去全球化、民粹主義和資本主義

|                     |         |
|---------------------|---------|
| 受損的政治生態 .....       | 347     |
| 不患寡，患不均 .....       | 353     |
| 節制 21 世紀的資本 .....   | 359     |
| 贏家通吃的隱憂 .....       | 373     |
| 全球化管理的失敗 .....      | 381     |
| 自由貿易的劫數 .....       | 387     |
| 天堂很遠、美國很近 .....     | 394     |
| 狂喜與恐懼；資本主義與民粹 ..... | 401     |
| <br>致謝 .....        | <br>415 |

## 推薦序一

朱民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IMF 前副總裁

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財經》駐美國特派記者金焱的新作《親歷美國逆轉》。駐美的六七年間，金焱通過她在美國持續的田野調查式的走訪，對美國政經軍等不同領域的決策者、以及專家學者廣泛地對話、交流和採訪，包括卡特總統、格林斯潘，斯蒂格利茨、保羅·沃爾克、瑞·達利歐等等，寫下了數百篇採訪報告。在美國期間她親身經歷了中美關係的逆轉，從合作到競爭到抗爭，以及這一巨變背後深層原因——美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變化。這其中有些是翻轉，有些是週期性的變化。本書以金焱第一手的觀察，以及對這些變化做出的系統梳理，向大眾展示了美國在過去十年內發生的社會思潮的變遷，經濟的位移、市場的轉軌和政治的流變。並嘗試解讀美國經歷的一系列時運變遷是中美關係的變化最深層次的推手。

中美製造業的競合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金焱在書中濃墨重彩地描述了美國製造業的衰退，及之後數年美國重振製造業的努力。2013年，美國製造業向價值鏈更高的方向發展的努力見到一些成果，美國製造業處於上升的通道上，但同年，中國製造業總的增加值第一次超過了美國，中國以製造業強國的



形象出現。從全球來看，2000 年的全球製造業產業鏈格局，主要是以美國為主的泛太平洋製造業產業鏈和德國為主的歐洲製造業產業鏈兩大板塊。中國的製造業是通過連接中國台灣省，然後連接到韓國，再和美國的製造業產業鏈相接。2015 年，全球已經形成了新的三大製造業產業鏈，德國仍然是歐洲製造業產業鏈的中心，中國的製造業迅速發展，成為亞洲製造業產業鏈的中心，而美國則變成北美地區的製造業產業鏈中心。

雖然規模上沒有中國製造業那麼大，但美國更多地關注於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如飛機製造和高科技領域有關的製造業，而中國的製造業還更多地關注低端。從公司的盈利角度來看，美國製造業的盈利能力要比中國的公司高很多。但美國高端製造業的競爭能力也在下降。美國原來對中國的高端技術產品的出口市場份額佔中國進口市場份額的 16.8%，2016 年這個份額跌了一半，只佔 8.2%，跌出的市場份額給了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省。可見在國際競爭上，美國高端製造業產品的競爭能力在下降。美國有無數新科技的發明卻無法產業化，這反映了市場的功能失效，也反映了政府宏觀政策的失效。

中美兩國都在奮力向製造業價值鏈的上端爬，特朗普政府選擇在《中國製造 2025》問題上挑起貿易戰，但製造業的最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化過程，未來尚不可預測。我從宏觀統計看問題，金焱的書中有這方面的記錄，也提到了美國製造業企業微觀的故事，以及故事折射的政策效果，值得細讀。

我第一次遇見金焱是在多年前的達沃斯會議上，我們都在聽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分論壇，之後她也多次採訪過我。她駐華盛頓時正巧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採訪和交流都多了。金焱專業、嚴謹，勤奮，觀察敏銳。每次採訪，她都準備詳細，提出很專業的問題，追根尋源。本書故事生動，資料翔實，分析獨到，值得一讀。

## 推薦序二・重新思考美國的危機與轉變

馬蔚華 國家科技成果轉換引導基金理事長、招商銀行原行長

《財經》駐華盛頓分社的社長金焱要出這本書，發給我提前閱讀，讀後頗為感慨。其中很多章節的精彩記述，觸發了我關於美國的記憶的閘門。

二十多年前，因為招商銀行要在紐約設機構，我開始和美國人有了比較多的工作交流和私人交往。中國金融機構進入華爾街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我和團隊歷經十年，輾轉周折，總算如願以償。2008年10月我們紐約分行開業，成為美國實行外國銀行監管法後第一個進入紐約的中資銀行。二十多年來和許多的美國人打交道，一方面深刻認識了美國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的傲慢與偏見，另一方面也深深感覺到美國朋友的坦誠與熱情。

分行開業時正逢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當時我密切關注，擔心危機全球化，影響中國。為此我也多次去美國，深入探索危機發生的原因。結果我有點意外，美國市場經濟和金融自由所存在的結構性風險的確不小，有時還會失控，短期內難以根本解決。當時我就有個模糊的判斷，金融危機只是美國經濟社會風險的一次集中爆發而已，它的根子深植於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最近幾年，我專注於公益事業，因為參與創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我與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等企業家、慈善家，以及與洛克菲勒等美國公益人士交往很多，他們對待財富的態度，對待社會公益的做法，常常出乎我的意料，這也讓我進一步認識了美國的多重性。

在我看來，美國無疑是一個偉大而複雜的國家，它是多元、多重、多面的。它的榮耀和挑戰，它的危機和變革，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2017年特朗普上任之後，美國的內外政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中美關係也出現了多年沒有的情況，幾乎全世界都在思考「為甚麼會這樣？」弄清這個問題對我們認識中美關係的由來，把握中美關係的未來非常重要。

在金融危機十年之際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美國的危機和變革，並非始於就任總統沒幾年的特朗普，而是始於他和他之前的美國政界和金融界，始於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甚至始於此之前美國社會的變化。

回想2008年夏天雷曼兄弟倒掉時，華爾街風雨飄搖，全球金融業人士無不感到唇亡齒寒。對於那場危機因何發生，2008年10月初，也就是那場危機正在蔓延的緊張時刻，我因分行開業探訪了華爾街，有機會與美國政府官員、金融監管者、銀行家、倒閉者、倖存者一一相見。

那時華爾街的金融機構都命繫於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這三駕救市馬車，他們想救誰，誰就更有可能躲過一劫，否則就會像貝爾斯登或雷曼兄弟那樣倒

掉。蓋特納那時是紐約聯儲行長，後任美國財政部部長。我當時問蓋特納：「你覺得本次危機的根源在哪裡？當前最需要解決的是甚麼？美國將會走向何方？」

我還記得，蓋特納回答說：「遇到危機監管部門需要果斷行動，不能坐視不管，任其自然；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阻止它，不能坐以待斃。目前我們也正在動用一切能使用的權力。」他的回答多少有點出乎我意料，因為在此之前，大多數人相信，美國是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不會輕易干預市場的運行，但危機改變了這一點。

蓋特納還介紹說，當時美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健康的，比許多國家都好；美國大部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是健康的；美國的家庭除了少數因為失業率增長、房價下跌受到一些影響外，大部分也是好的。因此他當時預計，雖然金融危機對美國有一定影響，但也不過是讓美國經濟長期經歷低速增長期，不至於崩潰。

這十年來的事實證明，蓋特納的判斷還是基本正確的。經過一系列的救市政策，美國在危機發生後不到 5 年時間裡，就完全恢復了經濟增長，且在 2018 年創造了 4% 左右的季度增長，這無疑是令人驚奇的。

今天我們回顧這場金融危機，是為了重新思考未來持續發展之路。當時雷曼兄弟破產是危機壓力下的應急之策。因此問題的核心就是雷曼是否應該破產？這個問題有些尖銳，也非常重大，我最終還是問了蓋特納：「如果再讓你重新選擇，你會

讓雷曼破產嗎？」蓋特納當時低頭沉思了好一會兒，搖搖頭，但沒有說話。但我相信，在他內心裡，美國究竟應當如何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同時我也很想知道，美聯儲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應對是對還是錯？美國經濟進入大衰退後，美聯儲為救助危機面對一次次艱難的抉擇，在連降10次息、把聯邦基金利率從5.25%降到了0-0.25%（零利率），之後進入量化寬鬆時期，採取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等方式，向市場大量「放水」，導致了全球流動性的氾濫。如今正是美聯儲量化寬鬆的逐步退出，引發了對美國經濟可能走向衰退的猜測。這真是一個堪稱經典的危機轉變。專家們分析認為，QE誠然緩和了金融市場中流動性枯竭的壓力，使經濟逐漸恢復，但是這未能為更深入的改革讓路。救助了銀行，救助了大公司，卻沒有詳細討論從銀行家到央行官員、從監管機構到政治家各自要承擔的責任。量化寬鬆政策加劇了資產價格泡沫和不平等，一些已經深入人心的準則也受到拷問。這讓我進一步看到美國方方面面的複雜性，很難一概而論。

最近兩年，美國的變化更大，特別是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很多新的利益與力量都冒了出來，並大行其道，美國進入了喧鬧的轉折期。比如反對自由貿易而堂而皇之地主張「公平貿易」，反對TPP與TTIP等多邊協定，傾向於雙邊協定；比如「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吸引製造業回歸國等各種亂象，讓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變了。

這一切的背後，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變化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民粹主義的崛起。美國民粹主義有着長久的歷史傳統，三 K 黨、喬治·華萊士和臭名昭著的約瑟夫·麥卡錫主義，19 世紀的威廉·布賴恩以及在美國政黨政治中曇花一現的民粹主義「美國人黨」都充滿了民粹主義的影子。當下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則標誌着美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民粹主義時代，對美國政治乃至整個世界秩序而言都將是一個分水嶺。

這一輪新民粹主義的經濟源起，在於貧富差距擴大。1980 年代開始的全球化運動，以科技創新、資產市場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價值，去年蘋果和亞馬遜的市值都曾達萬億美元，富可敵國，大量的財富流向了不到 1% 的少數人，而大部分的社會群體獲益不多，沒有獲益，有的甚至淪為受害者。

財富分配不公，絕對貧困化、相對貧困化加劇，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就美國而言，19 世紀、20 世紀初的民粹主義者主體是社會最底層的工人階級，新近的美國民粹主義則主要來自中產階級。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中產階級佔比 75%—80%，但是今天不到 50%。就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美國的中產階級減少了 25% 左右。儘管經濟在復蘇，工作機會在增加，但美國的經濟結構並沒有向中產階級和勞工階層轉型——收入和財富繼續向最高收入人群聚集；造成巨大災難的金融擴張並未被遏制；而政治家們，包括在 2008 年給美國人帶來比今天的特朗普更激動人心承諾的奧巴馬，也最終向華爾街屈服。這

就是為甚麼在這一波的民粹主義中，老百姓充滿了憂慮與憤怒。

心理學和社會學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當中心理失衡最嚴重、最易於訴諸極端情緒和行為的人群，不是那些處在收入分配最底端的窮人，而是那些「新窮人」——那些自認為正在被「剝奪」，正在被邊緣化、發生身份認同危機的人群。據稱相信美國夢的人數降到了 20 年來的最低點。尤其是年輕人更為悲觀。大量研究顯示，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日益下降，世襲精英制似乎正在統治美國勞動力市場，使年輕人改變家庭命運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由此可見，作為美國社會穩定基石、「美國夢」的主要載體的中產階級的主體地位不斷衰落，使得他們在政治上變得更為激進，不滿情緒隨之加劇、爆發。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角度看，民粹主義的興起總出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危機或轉型時期，不安全感是民粹主義浪潮的本質，民眾對於具體的經濟利益威脅、政治權利弱化、抽象的身份認同危機的不安全感需要回應，民粹主義正是抓住了這樣的需求，回應這種不安全感。美國經濟的復蘇之路依舊坎坷，美國的戰略地位不斷受到挑戰，傳統的單極化世界正在向多元化的世界演變，美國民眾在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和心理上都將面臨落差所帶來的衝擊，民粹主義將會繼續在美國社會蔓延，導致美國的對外戰略和對內戰略的調整，歐洲在敘利亞難民問題上的束手無策，「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亂局和「伊斯蘭國」勢力壯大，將會加劇民粹主義在世界的影響，這也會給未來世界的和平發展埋下隱患。



金焱的判斷與我不謀而合。她作為《財經》華盛頓分社社長，近年來常駐華盛頓，寫了大量報道，描述美國經濟與社會正在出現的各種大變化和潛在大挑戰。在這本新書《親歷美國逆轉》中，她對十年前華爾街金融危機事實上是如何演進的，有極為生動的描述，用大量可求證的細節，給我們以很多新信息與新洞見。本書從貨幣政策的角度出發，但沒有就經濟而論經濟，而是更深入地挖掘美國內部各種矛盾如何因貨幣政策而被激化、貨幣政策如何與民眾的危機意識牽連起來，互為因果，最終各種變化和指向帶來了美國的轉向。她發現，金融危機後，民主和全球化受到挑戰。而民粹主義成為一股泥沙俱下的力量，導致了特朗普上台，民族主義沉渣泛起。如果這些力量持續推動，美國必然要進行更大範圍的國家轉向，可能有週期性的變化，也可能是結構性的逆轉。十年前的金融危機應當只是美國轉向的一個例證。

仔細看金焱的全書，話題跨度很廣，從美國的政治、經濟、政策，談到社會、外交、文化和思潮流變等問題，多角度地將各種因素與現實相交互的前因後果展現出來，有利於讀者朋友認識一個真實的美國。

### 推薦序三

何帆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美國怎麼了？

為甚麼特朗普會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為甚麼要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美國這是要顛覆自己一手創立的全球經濟體系嗎？歐洲還算不算美國的盟友？東亞的日本和韓國呢？誰能代表美國？誰又能代表未來的美國？

美國已經不是我們曾經熟悉的美國，中美關係也不再是我們曾經熟悉的中美關係。借用經濟學中的一個說法，中美之間的關係在過去三四十年經歷了一個「大溫和」(Great Moderation) 時代。很多學者把中美關係概括為「愛恨交加」，也就是說，中美關係好了好不到哪裡，壞了壞不到哪裡。遺憾的是，這種判斷已經不再成立。美國已經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意味着，過去幾年美國的對華政策大辯論已經有了「標準答案」。2018 年，中美關係已經擊穿支撐線，可能進入新一輪下跌行情。

在新一輪的下跌行情中，中美關係可能出現的摩擦已經不僅限於經貿問題，有可能會向外交和安全領域外溢，甚至導致雙邊關係敵對化。美國副總統彭斯 2018 年 10 月 4 日發表了一個針對中國的演講，這個演講中所傳達的信息就是美國因未能

改變中國的制度和道路而感到的挫敗感。演講指出，美國打算全面對抗中國崛起，從貿易投資政策到知識產權報告，從網絡攻擊到「中國干涉美國內政」，從「債務外交」到「審查文化」。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評價說：這是2018年發生的最重要事件，因為這意味着中美長期衝突的開端。

雖然馬丁·沃爾夫把彭斯演講視為2018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但這件事情在美國政治中只是一個小小的漣漪。

在特朗普的眼裡，彭斯的演講不過是向自己示好的一種信號，也是為共和黨在中期選舉贏得更多席位做的宣傳。他一定會覺得，這個演講既不如他在6月12日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聖淘沙島嘉佩樂酒店舉行首場歷史性會晤那麼過癮，也不如5月14日美國在耶路撒冷舉行駐以使館遷址儀式那麼刺激。在全球媒體的眼中，2018年全球最黑暗的一天應該是10月2日。這一天，常居美國並任《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的沙特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走進伊斯坦布爾的沙特駐土耳其領事館辦理離婚證明，結果慘遭殺害，據說他是被活活肢解的。很多媒體哀歎：歷史在這一天倒退了一千年。在美國民眾的眼裡，彭斯的演講並沒有激起太大的波瀾，美國人更關注的是10月9日卡瓦諾以50票支持48票反對的微弱多數當選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新任終身大法官。幾乎所有的共和黨議員都投贊成票，幾乎所有的民主黨議員都投反對票，這是美國1881年以來批准聯邦最高大法官人選投票中黨

派分化最嚴重的一次。美國人也更關注 10 月 27 日在美國匹茲堡市一座猶太教堂發生的槍擊事件。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由仇恨引發的悲劇。再往前追溯，2017 年 8 月 12 日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發生的一場騷亂揭開了美國掩蓋了 150 多年的歷史傷疤。這場騷亂源自於白人民族主義者遊行示威，抗議政府拆除南北戰爭中南方聯盟的統帥羅伯特·李將軍的雕像。很多人天真地認為，美國在內戰之後沒有留下仇恨。如今，夏洛茨維爾事件極具象徵意義地宣告：美國國內政治出現了新的「內戰」。

因此，如果我們像剝洋蔥一樣層層剝開真相，就會發現，中美貿易戰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背後的中美關係轉折點。中美關係轉折點並不來自於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和政策調整，而是來自於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這就是《財經》雜誌駐美記者金焱所說的，美國出現了「逆轉」。

作出這個判斷，是金焱在美國的七八年記者生涯中，跟包括政府官員、智庫學者、企業家和金融家、普通工人，甚至包括刑滿釋放人員，深入交流，細心觀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最後得出的結論。

跟着金焱，我們將去拜訪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其中有鐵鏟地帶的藍領工人，也有收入不菲的白人白領；有年長者，也有年輕人；有盎格魯撒克遜人，也有少數族裔，包括一些狂熱支持特朗普的華人。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五花八門，他們之間其實並沒有太多共同點，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共同點，或許就是：

他們都討厭以希拉里·克林頓為代表的精英。

這說明，精英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可能有誤。在精英看來，居然有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說明這個世界錯了，但實際上，這說明這個世界變了。有一批美國人並不支持急速推進的全球化和科技進步，他們想要回到過去那個競爭不激烈的「黃金時代」。

跟着金焱，我們將去美國的鐵鏽地帶探訪。她會帶我們到水牛城、底特律、加里、巴爾的摩等地，去探尋美國的製造業復興和城市再造之路。這裡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有往日的榮光，也有未來的夢想。

仔細看，你會發現，美國的製造業一直保持着和全球化的聯繫。鐵鏽地帶的沒落，無非是全球化價值鏈重塑過程中的一個縮影。離岸生產和外包造成了製造業遷出美國，但物聯網、定制化生產、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興起是否會導致全球生產佈局再度出現重大調整？我們仍然需要耐心觀察。

跟着金焱，我們將去拜訪各界人士，了解他們對中美關係的觀察。我們會看到，正如中國對美國存在着諸多誤解一樣，美國同樣不了解中國。認知的分歧、利益的衝突，加上政策的誤判，很可能會引發兩國之間更多的摩擦。

這告訴我們，如果想要真正地了解美國，就必須承認，美國是由一群日益分裂的「集團」構成的。內政決定外交，美國的對華政策更多反映出來的是其國內的矛盾。由於美國感受到國內政治分裂的焦慮、經濟競爭力下滑的失望、普通民眾的不

滿，因此，美國要尋求對中美關係的重新定義、對遊戲規則的重新設計，美國仍然會對華「接觸」，但會有更多的「圍堵」。我們可能不得不接受一個「在對抗中尋求合作」的新挑戰。但是，也是因為美國國內政治的分化和矛盾，使得美國難以形成一種有效的對華戰略。

金焱為我們展示的美國的「逆轉」，正發生在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各個層面。這些「逆轉」會對我們過去的認知模式帶來挑戰。或許，你會發現，美國正在經歷的這些矛盾和衝突久已有之，但卻一直被執政者和精英忽視了。金焱的這本書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要想真正了解美國，必須腳踏實地、深入美國社會，你會看到跟你想像中大不一樣的「許多個美國」。

## 自序

### (一)

幾年前，我從北京以「特派記者」的身份飛抵華盛頓時，和所有出國旅遊的人一樣，只有一個大旅行箱和小的隨身行李。不同的是，那是我旅居華盛頓的全部家當。甚至在唯一的大旅行箱裡，一半空間給了一牀被子，因為有經驗的朋友提醒我，被子可以應對睡無居所的最壞可能。

華盛頓精緻宜居，卻臭名昭著——這裡財富和政治相伴相生，福蔭數代的富貴家族與階層在此政治聯姻，政治和旅遊是華盛頓的兩大支柱產業，華盛頓因此沒有污染，在美國大多數地方被金融危機和大衰退折磨時，華盛頓因此而經濟平穩，稱富一方。

我喜歡華盛頓，但我去美國其他地方出差時，人們看我的目光不無同情——他們認為我生活在美國最不堪的地方——國會山，那個被大多數中國人誤以為白宮的建築，成為美國意識形態極化孕育和爆發的中心；過去不同政黨間意識形態的重疊幾乎徹底消失了。我發現，每有曾代表尋求兩黨共識的老政客死去，人們都像緬懷先烈一樣追思他們的事跡，但說歸說，在黨爭為上的大前提下，尋求兩黨共識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就像中庸之人不招人待見一樣，在政治上的新風向是，越偏激越有市場。

這裡有個說法，在華盛頓住了四年就可以說自己是華盛頓人了——2016年，我在華盛頓住滿四年之際，美國歷史駛入了可能是最讓人困惑、癡狂，也最讓人着迷的階段，而這不僅僅是因為特朗普的存在，或者可以說，特朗普讓這一段歷史更為戲劇化。

我到美國之前通過書本、與人交流樹立的所有關於美國的概念，都被無情挑戰。

我的一個在矽谷做工程師的親戚曾不無驕傲地對我說，她根本不關心所謂聯邦政府，她不關心政客，無論是立法還是行政，華盛頓的政黨交替、權力更迭對地方沒有影響。但我身處的政治現實是，政治已不再局限於華盛頓，特朗普更把政治運動競選化變成了日常。美國彷彿突然發現了不一樣的政治，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美國的政治運轉失靈。

有幾個在常青藤大學讀博士的美國朋友曾和我談起所謂抗議示威的敏感，他們的結論是，它本身不敏感，起碼在美國不是，因為美國人就不太情緒化，人們舉着標語走上街頭甚至有說有笑。確實，我半看熱鬧參與的幾次大規模遊行都閒適而鬆散。但最近幾年，街頭抗議活動越來越情緒化，暴力和失控充斥其中。最初，白人警察殺害無辜非洲裔的事件引發了社會的不安，騷亂、宵禁、緊急狀態等等在弗格森、紐約、巴爾的摩、巴吞魯日、夏洛特等地輪翻上演。到了2017年，弗吉尼亞的種族暴力衝突更把美國推入新的極端，3K黨舉着火炬的場面已夠驚心動魄，隨後轎車衝進遊行隊伍，造成多人死傷的畫面



更加超現實。

我常在微信群上與家人、同事、朋友聊美國。談及美國經濟很容易取得共識——靠其內在張力，美國經濟能快速釋放能量，它有相當強的自我修復能力。但美國的種族問題，黑人與白人間的種族痼疾，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各族裔間日漸撕裂的現實，讓我這個外人都覺得很沮喪。

我有一個特別要好的黑人朋友，她講的大多數事情我都相信，唯一她說，她當年接到了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的錄取通知，卻決定到華盛頓的霍華德大學 (Howard University) 念書，因為後者是全美著名的黑人大學，我是打死也不信的。但她的告白彰顯了美國社會黑人和白人的鴻溝，統計數據說，白人擁有的財富約為美國黑人的 12 倍，黑人的失業率、貧困率、輟學率均為白人的兩倍以上。黑人男性犯罪入獄率是 1/15，白人則為 1/106。

很多人把化解美國種族對立的希望放在下一代人身上，我並不樂觀。

華盛頓當地人的熱門去處之一是動物園，恰巧在我住處附近。每年華盛頓動物園「復活節週一」(Easter Monday) 都是非洲裔家庭聚集玩樂的日子，已成為民間的傳統。有一年的「復活節週一」，下午三四點鐘，我參加完會議後坐地鐵回家，因忙於處理郵件，我進地鐵車廂時連頭都沒抬。

很快我發現了異樣，在那節車廂中我是唯一一個不是黑人的乘客。整個車廂都擠滿了非洲裔青少年，他們大聲吵嚷着，

詛咒叫罵着白人，每個咒罵都會引發一連串的口哨和起鬨，並把打算上車的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乘客逼退回站台上。

我如坐針氈地捱了十五分鐘才到動物園站，我膽戰心驚地從那黑皮膚的海洋中逃出，卻又直接捲入了一場槍擊案。在美國的幾年，我無意中捲入進兩場槍擊案。

在經濟不景氣時，美國政治碎片化、人們情緒對立化的趨勢惡化，這也解釋了那幾年美國重大槍擊案變得頻發，控槍問題成為移民問題、種族問題之外，美國社會極化的另一個焦點。

按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定義，造成 4 人以上死亡的單起槍擊事件，即被定義為重大槍擊事件。動物園門口的那場槍擊案甚至都沒引起華盛頓當地人的關注，畢竟量級如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在媒體上鋪天蓋地討論幾天就不了了之了。拉斯維加斯槍擊案是 2017 年 275 天裡發生的第 273 起重大槍擊事件，也是美國現代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槍擊案。逝去的生命和「槍權神聖論」互相對立。

種族對立直接帶來了族裔政治大行其道。奧巴馬當選，黑人和少數族裔的功勞不可替代，特朗普當選，黑人投票率非常之低，他當選的功勞要歸給那近半數的美國棄選選民。

很多時候生活在華盛頓，好像生活在一個假美國。這裡我的大多數美國朋友都受過很高的教育，有國際化視野，政策主張比較溫和，這也符合我對美國的想像，但後來才知道這樣的美國只局限於東西海岸和主要都市圈中，局限於很高教育程度的人群中；而我不經常去的美國中部和鄉村地區，那裡受教育

程度不高的中老年白人男性主宰，那可能才是一個真美國。

美國的社會分化是地理上的，更是意識形態上的；這個分化是在現實生活中的，也是在網絡世界裡的。

作為媒體人，我也偶爾在美國記者圈子裡混。近年來因互聯網衝擊，美國媒體廣告收入銳減，曾經的商業模式受到威脅和挑戰，用戶群體持續流失。美國傳統媒體這些年來努力地尋求新的增長點，指望靠更專注於技術、更加數據化來改變頹勢。但社交媒體等新興媒體的興起和壯大無法抗拒，直接削弱了美國傳統媒體的影響力。

我和美國新聞學院的大學生交流時，他們問我，怎麼看美國媒體的弱點，我脫口而出：美國新聞偏政治化，新聞消費有不均衡性。用白話說，就是傾向於民主黨的就看 CNN，傾向於共和黨的鎖定 FOX 頻道，媒體的觀點不過是在反覆強化其自有受眾的政治傾向。

社交網絡和新媒體在這方面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在臉書上，政治觀點討論帶來的社會分化使我的很多朋友要麼在政治議題上變得極其小心，要麼完全沉默，要麼把朋友分類，政治陣營不同的人只被允許看吃吃喝喝無傷大雅的東西，觀點相同的人才會看到有政治觀點的貼子。網絡上的評論更有泛化為黨派之爭的趨勢。最可笑的是，美國一些轉載我的專欄和文章後面的評論中，也把我貼上了諸如「白左」一類的標籤，甚至沒搞明白我是一個外國人。

政治觀點的分歧傷害了人際關係、即使是家人間的密切關

係也是如此。人們傾向於與認同自己觀點的人交流互動。政治觀點調和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政治分歧被反覆強化。最終，美國民眾在現實世界的分化，在互聯網上也轉化為各種陣營和聯盟互相對壘。

美國熱衷於領導力的培訓，我也被選去參加過一些。我對美國界定領導力特質的描述記憶深刻，比如他們強調品格和誠信，強調對國家未來的強烈願景，強調將自己的小時代放入歷史的大時代，感覺美國對「以德服人」要求還挺高。

然後就有了特朗普。他不只是沒有「以德服人」，恰恰相反，他信口開河，話語間充斥着政治暴力性的語言，《大西洋月刊》長篇累牘地從心理學上論述了特普朗的特質：自大自戀，和而不同的反面——無可調和，喜好誇限誇大和渲染。所謂領袖的引領，在大的方面是美國用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來攪動世界秩序；在小的方面，我發現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特朗普，他多多少少帶出了人性惡的一面——我親耳聽到過不同陣營的人對意見不同人的惡言惡語。

當然，特朗普是所有問題的一個顯現，而所有問題的根源之一就是貧富分化。在過去三四十年間，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金融危機後政府選擇對銀行業的救助，選擇量化寬鬆，最後的結果是美國 1% 的富人，收入增長要快於剩下 99% 的人。

貧富分化觸目驚心，紐約最有錢的 1% 的人口佔當地經濟的比重是全美 1% 最富有人口佔全國經濟比重的兩倍。這不是

美國的特例。有人說倫敦是「1%的人口互相結婚」的地方。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喬爾·科特金 (Joel Kotkin) 告訴我，三藩市和紐約這類的美國大都市正處在「光榮的衰退之路」上，他的意思是說，中產階級會繼續縮小，除了受過極高教育水平的人或有錢人外，對其他人來說，機會將普遍減少。

我在美國能直觀地看到社會階層的分化，也有機會接觸世界1%的富人。描述富人的生活如何奢華是件無聊的事，真正讓我震驚的是，那1%的富人中，有些人的生活與現實完全脫節。我曾受邀參加一個與白宮過往甚密的權貴人士的家宴。其間我和一個大亨的老婆聊起了在不同場合如何穿戴的問題。我感慨自己到華盛頓時間不長，經常摸不到頭腦。大亨老婆非常和藹地表示理解，她說，白宮每次易主，都會重新引領穿戴的新標準。

那怎麼辦呢？我問。

大亨老婆說，你可以讓你的設計師幫你打理。

見我一臉懵懂，意識到我可能沒有設計師，她使勁想了想說，雖然你的私人購物專家差點，但也能應付。

## (二)

初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我最大的興趣是觀察其形色各異的城市。

我去過的美國城市不算很多，主要是一些工業鑄帶城市。

他們在我接觸的盛極而衰的城市史中，被講述得更多。探訪這些城市，還能在街角巷尾找到這些曾經的工業重鎮往昔的輝煌，也能看到它們走出工業衰敗，實現復興的努力。

講一個美國的故事相對單純，但當中國因素參與其中，就變得紛繁複雜。中國和美國因製造業而相生相克的故事在我眼前次第展開。

20多年前，美國一些製造業大州面臨困境，他們想到的出路是，對前來投資的海外製造商伸出稅收、貿易及投資的橄欖枝，引入國際資本以換來產業的升級換代。20年後，奧巴馬政府祭出了同樣的手段，用稅收、貿易和投資政策方面的傾斜來提振製造業。當時恰逢中國企業全球化的征程加速，海外投資井噴式的增長，製造業成為二者歷史交匯的一個節點。

那時候一波一波的中國製造業企業來美國考察投資設廠。中國經濟整體放緩，中國製造業企業的海外投資設廠契合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外國直接投資變得比貿易更重要。人們興奮地談論着中國企業全球化發展進入了新階段。

中國以全球最大買家的萬丈豪情在全球進行資產配置，動作頻繁迅猛，幾個大手筆收購引發了全球的關注。身在美國，我更切實地感受到了中國對併購投資的熱情和信念，估計它和當年的互聯網熱潮、前段時間的比特幣、區塊鏈的各種技術炒作都有一拚。那幾年我不停地聽說身邊有一搭無一搭的朋友都進入了投資併購領域。在微信上，他們不忘在自己的名字後加上一串定語強調，如「跨境投資專注教育」、「礦業投資併購」、

「投資併購律師」等等，一覺醒來，我發現自己也被拉進了幾個跨境併購的群。

2017 年我採訪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柯偉林 (William Kirby) 時，他和我總結說，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取得成功，但他們的作為與西方的商業常識相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的局限性有時如此之大，所以機會一出現你就必須抓住，否則機會窗口稍縱即逝。」

在美國，一場爭奪機會窗口的戰爭也在展開。我到美國時，關於美國製造業未來的討論已持續了數年。在此前的 20 多年中，美國除了製藥、電子和航空航天幾個少數產業有產出增長外，其他絕大多數製造業要麼增長緩慢，要麼大幅衰落。

金融危機發生後引發了各種反思，反思的結晶之一是，美國要逆轉製造業 20 多年的衰落，實體經濟與金融服務業間嚴重的斷層無法持續。數據顯示，在製造業上每投入 1 美元，美國經濟就會增加 1.32 美元。對亟需助力的美國經濟復蘇來說，製造業對經濟的正向影響難能可貴。那時製造業回歸那時不只在美國，在全球都成為大勢所趨，在各種努力下，2013 年製造業在全球獲得增長。

美國人對製造業有份執着的留戀。在製造業被提高到國家經濟競爭力這一高度之前，這份執着在民間就普遍存在。

離我最近的例子是我的美國朋友 Mark。他所在的馬里蘭伯利恆鋼鐵廠幾年前倒閉，他是成千上萬失業人中的一員，換了幾份工作後才在一家珠寶店安定下來。有一次閒聊，我提及

了「製造業」三個字，他就難壓鬱悶，不停地從手機裡翻過去的工作照，在網上找關於伯利恆鋼鐵廠的視頻。那些黑白畫面上的過去，直接對應着他這樣低技能的美國白人男性無法獲得更好就業的機會沮喪和焦慮。

在美國分享 Mark 的沮喪和焦慮的大有人在。想一想，1990 年，美國有 36 個州的製造業雇用人數超過所有其他部門，這兩年只剩下 7 個州製造業仍處於主導產業地位。1979 年美國有近二千萬人從事製造業，現在近三分之一的製造業工作已流失不再。

就像中國人執着於盛世大唐的想像，美國人執着於二戰直到四、五十年前，製造業給美國帶來的普遍繁榮。它支撐起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人也因從事製造業得以買房、購車、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度假。說起來，那是美國上一輩人的歷史，沒有大唐那麼久遠。

在各種美國遊的攻略中，尼亞加拉瀑布城是中國人的必遊之地；在美國人寫的旅遊攻略中，尼亞加拉瀑布城大多被歸為盡量不去遊覽之地。這不是中美審美文化的差異。在很多美國人看來，尼亞加拉瀑布城除了瀑布外甚麼都沒有。

大瀑布氣勢磅礴，它的背面則是美國製造業失落帶來城市頹敗、中產階級萎縮的標本。守着世界級壯美的大瀑布，當地人卻對製造業情有獨鍾，認為那才是正經事，製造業的工作才是有價值的工作；遊客、服務業與他們沒有心理上的互通互聯；所謂旅遊和文化之基可以吸引其他產業、帶動商業發展，



最終惠及當地居民的理念，他們也不認同，甚至對大力發展旅遊業心存不滿。

不只是瀑布城的人這麼偏執，那些過去製造業達到鼎盛然後從高處跌下的城市和地區、那些鏽帶工業城市的居民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心理。

無奈，製造業和商業週期聯繫得這樣緊密，以至於每次經濟衰退都對製造業打擊很大，直到現在，美國部分地區仍未從幾年前的大衰退中完全恢復過來。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密切地關注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實際上，美聯儲政策的風吹草動，既牽扯到全球經濟和金融風險，又牽扯到美聯儲與市場的互相博弈，還牽扯到美國經濟的穩固程度，在全球化的今天，聯儲議息會議的決定可以擾動整個全球經濟，也可以直接影響到在製造業衰退中掙扎的美國工人。

美聯儲主席的位置排名是全球的第三把交椅，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經濟政策制定者。事後看來，耶倫 (Janet Yellen) 走馬上任聯儲主席之際，在某種意義上，她無意間在政治上、在競選上拉了特朗普一把。

事情要追溯到 2015 年 12 月，在貨幣政策不確定性的風險基本被排除後，美聯儲最終選擇從超常規貨幣刺激時代轉型，進入到削減資產負債表增長率的時代，耶倫宣佈了近十年來的首次加息。美聯儲當時預見到的圖景是：未來美國經濟繼續溫和擴張，就業市場持續改善。考慮到影響美國經濟的國內外因

素，美聯儲認為經濟活動和就業市場面臨的風險大致平衡。隨着壓低通脹的暫時性因素逐漸消退，就業市場繼續改善，美國通脹率將回升到 2% 的目標水平。

美聯儲未能預見到首次加息引發了「小型的經濟衰退」，對能源，農業和製造業等部門造成了嚴重的打擊。這次小型經濟衰退從 2015 年底延續到 2016 年的大部分時間，拖累了美國鄉村地區和中部地區一些關鍵的產業，使得在 2016 年的美國大選中，受到影響地區的選民最終把轉變命運的希望投給了特朗普。

小型經濟衰退的證據是：美聯儲 2017 年 3 月發佈的年度修訂數據顯示，2014 年和 2015 年工業生產中的製造業增長被大幅下調。修訂前，製造業在 2014 年 7 月到 2017 年 2 月間增長了 3.8%。修訂後，增長率僅為 0.9%。對 2015 和 2016 年的修訂則顯示，很大一部分製造業生產消失，那段時間至 2017 年 2 月的增長僅為 -0.8%。這些修訂後的數字顯示，直到 2017 年 10 月，製造業的發展才超過 2014 年 7 月的水平，換句話說，製造業在三年中沒有增長。

以賓夕法尼亞州排名前五的大城市伊利 (Erie) 為例，這個瀕臨美國五大湖之伊利湖 (Lake Erie) 的城市，是美國製造業衰落形成「鐵鏽帶」的重災區之一。Michele Scrimenti 是自由撰稿人兼翻譯，他有個有趣的中文名叫米給力，他就來自伊利。他告訴我，伊利有很多工廠，主要和塑膠、沙子、礫石有關，最大的雇主則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在那裡的機車製造部

門。2015 年底，通用電氣公司宣佈伊利要解雇 4500 名員工中的三分之一，解雇潮持續到 2016 年夏，米給力說那段時間當地媒體的頭版有數週都是關於外包——中國電器製造商青島海爾 2016 年 1 月 15 日宣佈與 GE 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斥資 54 億美元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 GE 的家電業務資產。

當地經濟在裁員潮中大受影響，其失業率從 2015 年 11 月經季節性調整後的 5.1% 攀升至 2016 年 9 月份的 7.1%。因此，當特朗普在 2016 年競選期間尖銳地抨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說它是美國工人的噩耗時，真是說到了很多當地人的心坎上。那時伊利市已歷經了數十年的外來衝擊：先是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貿易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外包，轉移了伊利的就業機會；到上世紀 90 年代則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和中國的崛起；世紀之交，自動化開始發力，伊利市一蹶不振。

這個民主黨票倉重鎮，在 2016 年美國大選時集體倒戈支持共和黨的特朗普。事後證明，特朗普當選的關鍵就是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辛等幾個中西部州數萬選票的移轉。這些州的藍領工人面臨的窘境是，強大的工會提供的高工資、福利、社區甚至政治權力轉眼成為昨日黃花，失業的工人從 5 萬至 10 萬美元的年薪，一下子一無所有，時移事遷，新的工作機會要麼在大城市，要麼要大學文憑，要麼就是找些低端零售業和服務業的崗位。

年輕人當然可以選擇得到更多的教育，但教育成本自從上

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飆升，一年沒有一萬美元都不行，而對那些年齡在 35 歲到 60 歲之間、還要支撐家庭的，真是沒甚麼出路。所以他們選擇特朗普，一部分人寄希望於特朗普轉變他們的命運，或許有人只是藉此給生活在城市裡的自由派們一個大大的「Fxxk You」。千千萬萬個 Mark 形成的憤怒的力量，支持特朗普對「中國製造」說「不」，對傳統貿易動刀，開闢全新的戰場。

特朗普不只是對「中國製造」說不，他圍堵中國技術，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各種打算，在經歷了 40 年的輪迴後，中美關係難以回到從前的合作關係。

美國必須找到與中國接軌的方式，中國也必須找到同美國共存的方式，因為這是現實的世界，也是世界的現實。

在我的書即將出版時，我在紐約遇到了華爾街對衝基金之王瑞·達利歐 (Ray Dalio)。我問他，對於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競爭關係，誰能更好地管理它們？誰是背後的主宰力量？

達利歐說，國際關係的本質是一場國力對決，並沒有太多的國際法或條文約束。沒有人可以管理國際關係。領導者必須選擇增強國力的道路，這是硬道理。至於對中國決策者的建言，他說，繼續奉行讓中國變得偉大的政策和策略。



## 第一章

# 特朗普崛起

特朗普的美國是個非常憤怒的美國  
社會情緒的對立充斥在各個角落  
憤怒和對立形成的力量助推了特朗普的橫空出世  
他的一言一行又持續為美國的憤怒與對立提供氧氣  
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這樣的氧氣層中彼此各自敘事  
他們爭相向相反的方向拉扯美國本已四分五裂的社會  
那些掙扎的人們則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



## 一黨治國

### (一)

2018年5月，我去紐約參加一個全球投資領域的閉門會議。參會者多為大型投行、大型私募基金、對衝基金等投資、財富管理的負責人，平均下來每個人管理的資產大概能達到50億美元。這些資本界大佬們氣場強大，自信中多少有些自負，畢竟他們具有雲集影從的行業影響力，甚至可以創造新的市場。

我拿了些早餐，找了張沒人的桌子坐下來。對面很快坐下了一個體面而低調的中年男士，他的胸牌上寫着摩根大通的字樣。我們簡單地聊了起來。他提到了位於斯里蘭卡南部交通要衝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的港口，他講述了中國招商局集團如何巧妙地把連年巨額虧損的漢班托塔港作為目標，如何在關鍵時刻以11.2億美元的總投資獲得漢班托塔深水港99年的特許經營權，對該港口進行開發、運營和管理。

然後他話鋒一轉，說，這是典型的羅姆尼(Mitt Romney)打法，中國企業家是羅姆尼的好學生。



羅姆尼的名字在那兒之前我已經有幾年沒有聽到了。他人生的頂峰是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和前總統奧巴馬 (Barack Obama) 角力。此前他與人合夥開辦了投資公司貝恩資本，在他領導下，公司年投資回報率為 113%，通過控股併購獲利。

摩根大通男的話把我帶回到了 2012 年總統大選。那是我經歷的第一次美國大選。共和黨的黨內初選拖沓而冗長。2012 年 4 月 24 日，新一輪黨內初選在東北部的賓夕法尼亞州、康涅狄克州等五個州同時舉行。當天晚上羅姆尼出現在鏡頭前已經是五州連勝的霸主形象。在他看來，那場自 1976 年以來最長的一次共和黨內初選，已經可以提前奏起凱歌了——按照程序，共和黨還有 15 場初選，而羅姆尼離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也只剩下了一個程序。站在新罕布什爾州喧然沸騰的支持者面前，羅姆尼亮出宣言：「更好的美國始自今夜」，正式開始與奧巴馬對決。

羅姆尼是共和黨還算一個不錯的選擇：一個顧家有責任感的男人，一個善於審時度勢，當機立斷的商人，一個在政商兩界都有家道淵源，也有實踐經驗的成功人士。羅姆尼令貝恩資本投資公司轉危為安，把鹽湖城冬季奧運會奧委會從債務危機和行賄醜聞中挽救出來，這些強化了他對自己的商業管理、經營才能及財務管理能力的自信，並認為這些經歷已轉化為競選的技術優勢。

羅姆尼的優點這樣突出，以至於當年在佛羅里達州海濱城市坦帕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會議的主要目標之一、共和黨人關注的「最緊迫任務」是去除羅姆尼「選舉的最大障礙」——反擊民主黨把他描繪成不接地氣的精英分子，恢復他的商業形象。

那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膠着的一次選舉戰。雙方相持不下，就連

資金的籌集也如此。羅姆尼的競選團隊有強大的籌款能力，奧巴馬的團隊更以有競選資金優勢而聞名。統計數據顯示，民主黨和奧巴馬共籌集資金 12 億美元，羅姆尼和共和黨共籌集資金 11.8 億美元。

從務虛的層面看，羅姆尼和奧巴馬兩個人都有將意識形態讓位於效率的傾向，在政策執行上都傾向於較為理智。兩個競爭對手都是意志堅強的實用主義者，這也難怪羅姆尼的醫改方案與奧巴馬推銷的全國醫改版本所差不多。

但最終，羅姆尼敗給了尋求連任的奧巴馬。

在美國，我試圖去了解美國的總統政治，後來我發現很多權威人士和專家的預言最後大都落空了。2012 年大選期間，我請教的權威人士和專家的觀點是，雙方在經濟策略方面的角逐，將最終決定大選的落幕方式。

《美國政治年鑒》(*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一書作者、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研究員邁克爾·巴羅內 (Michael Barone) 就對我說，經濟問題對於選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處理經濟問題方面，民調傾向於支持羅姆尼，他的支持率要領先於奧巴馬。

歷史則一再證明，重要的是很多的相關誤差 (correlated error) 項。每次美國大選基本上是選民對此前積累問題的反應，即所謂的相關誤差。奧巴馬 2008 年贏得大選，那也表現了選民對伊拉克戰爭的美國立場，以及對金融危機的反應。伊拉克戰爭的僵局和金融危機後的經濟亂世——金融危機、股市暴跌，步履艱難讓奧巴馬得以成功晉身美國總統。

作為局外人，共和黨對我而言就是亞伯拉罕·林肯的政黨。民主黨則是經濟大蕭條時推行「新政」的羅斯福的政黨。民主黨和共和

黨的區別可以套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區別——保守主義者偏好減稅措施，因為它不重新分配財富，也沒有讓政府干涉市場；自由主義者偏好公共支出措施，因為它使政府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且可以改善社會中處境最差者的福利狀況，奧巴馬和羅姆尼的分歧也大體如此。

美國勞工部前副部長、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愛德華·蒙哥馬利 (Edward B. Montgomery) 曾在 2009 年擔任奧巴馬政府的汽車業復蘇計劃主管，對奧巴馬的救助政策有着近距離觀察。他對我歸納說，羅姆尼的專注點是減稅，主張降低對企業和資本收入的稅收，削減政府赤字和政府社會開支，減少監管干預。二者最大的區別是，在促進增長上，奧巴馬把政府視為私營部門的夥伴，羅姆尼則將政府比做私營部門的絆腳石。

羅姆尼努力地證實自己傳承了共和黨的衣鉢。在經濟政策主張上，羅姆尼恪守了共和黨保守主義的傳統：主張以涓滴經濟學 (Trickle-down Economics) 為理論依據的低稅收；主張回歸小政府，遠離所謂「歐洲式」福利社會；低赤字。

在意識形態上，羅姆尼也向共和黨的保守勢力靠攏。在此前十年的時間，共和黨內部裂痕日益擴大，政治極化，時常訴諸於政治邊緣主義，黨爭尖銳。這一趨勢迫使羅姆尼從 2008 年的共和黨右翼候選人完全蛻變成了 2012 年的左翼候選人，以此擺脫對手說他是「麻薩諸塞州的溫和政客」的攻擊。

共和黨內部保守勢力則繼續崛起，並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在 2012 年大選之後，激進的保守派陸續上演了讓政府關門之類的鬧劇，對此，更主流的共和黨則束手無策。

一個有趣的案例是 2014 年至 2015 年，圍繞美國進出口銀行去留，美國國會保守派展開了政治博弈。美國進出口銀行的主要職責是提供一般商業渠道所不能獲得的信貸支持促進美國商品及服務的出口、增加就業。但針對它的指責則譏稱它是企業福利的典範，痛斥它是裙帶資本主義的標桿等等。

該行董事長兼總裁弗雷德·霍赫貝格 (Fred Hochberg) 在 2015 年該行被迫暫停經營權之際，接受了我的採訪，自然不忘捍衛他領導的機構的合法性，他說，「美國有強大和有效的私營部門，所以大部分出口不需要靠美國進出口銀行融資。我們的角色相反是為那些商業銀行不能或不願提供幫助的美國出口商服務，使他們能夠開拓新市場，發展壯大，增加更多收入的就業。」

拋去法律層面的細節分析，顯然美國進出口銀行成為政治較量的一個山頭，因為報道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命運，我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個一直讓共和黨覺得難堪的實體機構，許多人把它描繪成政府對企業厚此薄彼、浪費政府開支、或對貿易進行管治的表現。

在意識形態領域，很多人認為，如果共和黨人打算和以「大政府、大花費」為立場的民主黨區別開來，那麼讓美國進出口銀行退出歷史舞台是很順手的選擇，是用立見分曉的辦法來檢驗共和黨能否回到自己小政府根基中去。這場意識形態的戰鬥雙方，一方是共和黨內部的持自由市場觀點理論的人士，對抗的一邊則是在華盛頓政府內部的當權者。

雖然美國進出口銀行後來獲得了期限至 2019 年的再次授權，但共和黨內的分化直接帶來了共和黨選民的分化。共和黨內反對建制派的聲音如此清晰而一浪高過一浪，最終把特朗普 (Donald Trump)

推向總統寶座。

## (二)

那年大選羅姆尼敗北，但敗北的原因和經濟議題關係並沒有人們預測的那樣大。四年後，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敗北，敗北的原因和經濟議題的關係也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大。人們開始重新梳理思路，發現一句很少被用的金句可以做為解釋：政治是文化的副產品 (politics is downstream from culture)。

政治是文化的副產品是基督教保守主義的觀點，大體上有幾層不同的含義：選民的政治觀點大多不像政治學者那樣經過深思熟慮的思考分析，相反，他們更多的是一種表達，包括對價值、對「酷」的事物，對恐懼，對愚蠢和聰明等等的表達；

大多數選民們通常把更多的時間精力和心力用於文化的追求——從大眾傳媒到電子遊戲的消費；從去教堂，去學校，去博物館，參加槍支俱樂部，參加舞蹈活動等不一而足——而不是用在政治追求上。所以對佔據了人們更多時間和空間的事物的態度，會影響和支配那些在他們生活中體量較小的事物的態度。不僅僅是他們的理念和信仰，更是他們所了解和信任的人；

年輕一代更傾向於從文化資源而不是明確的政治資源中，獲取他們的價值觀和「事實」。

比如羅姆尼在臨近大選時才意識到，最具爭議、最敏感的議題之一是移民問題。

羅姆尼在 2012 年初建議非法移民應該「自我遣返」——他們若找不到工作或無法獲得駕駛執照，就應該自行離開美國。半年後羅

姆尼收回此前的建議，說他贊成一個長期的、全面解決非法移民問題的方案。他沒有動搖的觀點是，反對為非法移民提供「大赦」或「磁石」，如駕照、工作和州內大學的學費。

與此相關，羅姆尼犯下的大錯是對少數族裔的忽視。這與其說是羅姆尼的誤判，不如說是共和黨的失誤。2012 年大選中，僅三成的拉丁裔、25% 的亞裔和 8% 的非洲裔選民表示支持共和黨。共和黨失去少數族裔選民的背景是，美國正在發生一場重大的人口變遷，拉丁裔選民那時已快速增長至美國選民的 10%，其中他們中的 70% 把票投給了奧巴馬。

在羅姆尼籌款期間，就有捐款者建議他重視弗吉尼亞州北部。弗吉尼亞是我每週都要去幾次的地方，過去一直是共和黨支持者的勢力範圍，但隨着越來越多的移民和不同族群的選民搬入，那裡的政治格局發生逆轉。弗吉尼亞北部的費爾法克斯郡，1992 年前有 3% 的居民在美國以外出生，2012 年這個比例接近 30%，民主黨兩次大選均在當地全勝而歸。

我的朋友 Don 是加州的專欄作家，每年他都在華盛頓與加州間往返數次，一方面是照顧兩地的房產，另一方面也便於他持續關注兩地的政治生態變化。他向我描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荷里活明星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就一邊倒地傾向於支持民主黨，搖滾樂藝人也大多是民主黨人，可能在美國藝術家中，願意認同共和黨保守的社會觀念與政策是鄉村歌手，他們大多在美國南方鄉村的白人家庭裡長大——共和黨、保守派與鄉村音樂是標配。

每個選民價值觀的形成，與其如何受教育本身沒有關係，卻與其價值觀如何形成有關，比如居住在同質、還是多元的環境裡，看

世界是全球視野，還是區域性的眼光。

在共和黨選民中，其文化觀照的窘境表現在，在移民、墮胎、宗教和同性戀權利等問題上過於強硬，無法通融。同時隨着亞裔、拉美裔移民的增加，激發了共和黨選民的深切的認同焦慮感。其中最為極端的例子是 Don 所在的加州。加州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是共和黨的天下，到了上世紀末就完全成了民主黨的地盤。近年來，加州登記的民主黨選民數量沒有太大變化，登記的共和黨人數卻下降了 10%。Don 在加州的保守派朋友描述說，他們感覺自己的存在就像瀕危物種一樣。

這個現實使南加州風格的共和黨保守主義變成了鬥爭的保守主義。他們並不關心政策有甚麼具體細微差別，似乎一切都為了「反意識形態」。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的政治記者湯姆·漢博格 (Tom Hamburger) 曾贈我一本他與人合作的書《一黨治國》(*One Party Country: The Republican Plan for Domi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如今回頭去看，小布殊任總統時，共和黨通過對自身運轉機器的嚴格檢視，一直努力建立保守派的優勢地位，現在共和黨仍然保持了這其中的一些動能。

2014 年中期選舉，共和黨利用白人選民對民主黨的反彈，利用成為少數黨危機「哀兵必勝」的戰略，在國會選舉、地方議會、州長選舉中大獲全勝。2016 年大選，共和黨人在州和地方層面的政治組織工作做得更好，並最大化地利用了選民對特定群體的厭惡、對其他群體政治資格的懷疑以及對自身前途的擔憂情緒，一舉拿下了美國聯邦政府的所有三個部門。共和黨又佔據了所有的政府分支，聯

邦最高法院的天平也因大法官的增補而偏向保守派，因此共和黨在推動其政策立場時更佔優勢。

美國又短暫地回到了一黨治國的時代。

此時的一黨之首是特朗普。他以總統身份面世後，不只搞得美國人手忙腳亂，幾乎全世界都跟着團團轉。特朗普政府顯然在效率上引人注目，以他上任的最初四個星期為例，他共簽署了 23 項總統行政命令、5 項法令，確認了 12 位內閣成員、叫停了 2 位內閣候選人、炒掉了國家安全顧問，發佈了 168 件未刪除的推特留言，本人及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和媒體見面三次掐架三次。但與其他總統的滿月期表現相比，特朗普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並未因當選總統而獲得人們的認可，不論是民主黨人還是相當數量的民眾，他們反特朗普的意願隨着時間推移而變得愈發堅定。

2018 年春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我與翰宇國際律師事務所 (Squire Patton Boggs LLP) 國際貿易的聯席主席弗蘭克·塞莫利茲 (Frank Samolis) 一起午餐，我們聊起了共和黨人的困惑，他說：「你也知道這屆政府是美國前見所未見的。」

特朗普是個異端。我試着理解他作為一個非傳統意義上的總統，他也許希望以商業領袖治理公司的成功模式，使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運轉，治理這個充滿痼疾的國家。

在政治目標與統治策略上，人們卻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查韋斯和普京等的影子：對法治或國家制度體系的獨立性大為嫌煩；國家利益、政黨利益和他個的利益混在一起；打擊異己，拉寵親信。不過我在美國大學教政治的幾個教授朋友倒並不擔心，在他們看來，美國長期的政治史表明，各種各樣的動盪和反覆會時有發生，政黨



也會隨時重新進行調整。

不過事實證明，共和黨在特朗普時代的調整是，它變成了特朗普的黨。

2016 年我到華盛頓整四年。當地人告訴我，四年足以讓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安頓下來。我安頓下來之際，我經歷的第二次美國大選和特朗普的憑空出現卻讓所有人亂了陣腳。我報道領域之一是貿易政策，特朗普當選前，我的貿易報道不鹹不淡，基本出現在雜誌次要的版面上。

在美國大選的籌碼中，貿易政策卻是重頭戲之一。2016 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 則部分承載了美國貿易政策的走向及其對全球貿易格局的導向影響。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貿易政策觀點有共同之處，二者都對以 TPP 為代表的自由貿易協定持負面態度，差異則表現在二者的激進程度上：特朗普非常激進，希拉里相對溫和。

仔細觀察過渡時期特朗普的舉動和言論，我發現他在貿易保護主義上的傾向已超出了競選說辭的範疇。贏得總統大選後不久，他就宣佈將把美國從 TPP 中撤出，他任命的幾個貿易崗位上的關鍵人物都有保護主義傾向。同樣，特朗普對一些他有異議的企業也以關稅相威脅。

最初人們驚呼，這也與國會共和黨人中堅持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背道而馳。後來人們才意識到，特朗普用反自由貿易的立場逆轉了共和黨。

共和黨人一直以來秉持自由貿易理念。特朗普用他言之鑿鑿的

「美國優先」的理念和民粹主義驅動的方法，顛覆了共和黨自由貿易的宗旨。

就像塞莫利茲對我說的，美國總統與其在國會的共和黨之間的關係也是前所未有的——總統主導共和黨，完全削弱了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他們不同意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卻也無法挑戰總統特朗普。所有這些都是全新而陌生的。他舉例說，特朗普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發起「232 調查」，很多共和黨領導人、包括美眾議院議長瑞安都不同意特朗普這麼做。但他們從來沒能真正地挑戰特朗普。因此，一些受尊敬的共和黨領導人在經濟和貿易政策上，傾向於完全聽命於特朗普。

塞莫利茲總結說，之所以共和黨人不敢挑戰特朗普，是恐懼他根基的力量。那種力量就是 90% 的人都說他不會競選成為總統，他就在美國公眾面前成為了總統。

羅姆尼也未能幸免。2012 年競選總統失敗後，羅姆尼一直行事低調。在 2016 年美國共和黨內競爭候選人提名時，他高調指責特朗普「既沒有作為總統的氣質，也沒有作為總統的決斷力」，直言特朗普是欺凌弱小、歧視女性還不誠實。

特朗普當選後，羅姆尼語氣大為緩和。羅姆尼似乎接受了其他共和黨同僚對待特朗普的態度和策略，它既可以是他們對特朗普的底線，也是國會共和黨人大多數時候對特朗普聽之任之的原因。在他們看來，只要特朗普推出一些保守主義的政策，從減稅到積極地放鬆監管，並提名保守派大法官，所有其他的東西，無論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各種蠱惑人心，甚至是破壞民主規範，都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特朗普時代，參議院共和黨人意識並接受了這樣的事

實，他們無法改變現狀。

在我的觀察中，大多數共和黨人並不真的想要特朗普。共和黨想要讓他們的政黨比過去更加有效，特朗普提供了共和黨的所需所想，雖然只是曇花一現。

羅姆尼在 2018 年 11 月贏得猶他州聯邦參議員席位，一時間共和黨內突現曙光。也許羅姆尼會成為制衡特朗普的力量，至少，他會幫助共和黨找尋並重拾保守主義的勇氣和夢想。但像所有那些挺身挑戰特朗普的共和黨人一樣，這個曙光瞬間爆發隨即湮滅。羅姆尼在 2019 年秋因直接間接批評特朗普而再度惹來關注，結果是無論在共和黨的參議院，還是他所在的猶他州，甚至全美國，羅姆尼都因此而備受孤立。隨着時間的流逝，特朗普的身形變得越來越高大，共和黨成為他投在地上的影子。

## 政治 + 正確

在我能熟練掌握的所有英文單詞中，最讓我覺得奧妙無窮的單詞是：「歧視」(discrimination)。來美國前，我聽過好多事例講美國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有多麼上綱上線。真的到了美國，才發現「歧視」的定義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一次和美國女友們閒聊，我說有朋友從中國來看我，他說我「好像胖了」。美國女友們頓時花容失色，彷彿我這個朋友說的不是「好像胖了」，而是「你怎麼胖得和豬一樣」；對她們來講，這是對「胖子的歧視」。甚至我被告之，不可以像中國人一樣，對一家人的相貌進行排序，說「她是家裡孩子中長得最好看的」，這是「相貌歧視」。

有一天，一幫人討論一對男同性戀，我們各自說了對這對眷侶的看法。其中一個人說，「我不喜歡他們畫了濃妝、四處秀恩愛」，旁邊立刻有人糾正他說，「你這是性取向歧視，為甚麼男女秀恩愛就可以？」

我搬到華盛頓時，奧巴馬第一屆任期已盡尾聲。在第一屆的四年中，奧巴馬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逐步推動同性戀婚姻問題，LGBT 這個詞也應運而生。LGBT 指代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和跨性別者，中文則直接用更短小精悍的「同志」一詞做通稱。

奧巴馬善於思辯，他的幽默和遠見與他幾乎完美的演講技巧珠聯璧合。奧巴馬着力推動美國關於 LGBT 公眾輿論的巨大轉變，同性戀伴侶結婚這個原來大不敬的問題，逐漸變得越來越被社會所接受，就連把婚姻嚴格限制在一男一女之間的保守共和黨人也轉變了觀念，支持同性戀伴侶結婚的人數超過了反對的人數。

功不可沒的奧巴馬因此成為美國史上首位登上 LGBT 雜誌封面的在任總統，雜誌對奧巴馬這樣評價說：「一位在狂熱支持下入主白宮的總統，似乎在中途勢頭減弱……稍事休整後，他幫助我們實現了婚姻平等，並推出了其他改變我們在美國社會地位的里程碑式提案。」

美國社會的寬容程度日漸增大，尤其在華盛頓，自由開明的人士很多，他們經常介紹我認識一些同性戀伴侶。私下聚會時，我常會聽到他們被社會視為異類的苦痛和掙扎。但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能接受和自己差異極大的人。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接受 LGBT 就等同於接受社會墮落。

尖銳的批評指責奧巴馬有些高傲自大、經驗不足，行事有點「荷里活」。就連在奧巴馬支持率最高的人口分組、黑人當中，也有人抱怨他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同性戀和移民的身上，卻創造了太少的工作機會。

當美國學校的性教育課上開始講同性戀，講父母再不意味着一男一女時，美國有一些家長開始憂心孩子的價值觀受到影響。這樣的情緒很快因為「廁所令」而發酵沸騰，成為 2016 年大選的轉折點。我認識的一些華人選民因此堅決投入到支持特朗普的陣營中。

廁所令是奧巴馬政府出台的法令，要求公立學校允許「跨性別」學生根據「心理性別」而非「生理性別」選擇衛生間和更衣室，「性別」的概念從此開始要包括個人自稱的性別身份。當「廁所令」最初在芝加哥等地試行時，就引發了很多家長，尤其是華人家長的憤怒，後來它成為法令在全美推出，政府威脅不遵守這一規則的學校將被減少聯邦撥款後，一些美國人的憤怒就直接指向奧巴馬和民主黨。

民主黨的一些價值觀對一些美國人來講，理想太高，他們跟不上，也不想跟。

一個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人對我說，這是有意製造不同性取向人之間的矛盾，大量渲染 LGBT 成為一種時髦，他們擔心孩子被這個傾向裹挾。

圍繞於此的輿論在 2016 年 5 月前後推向高潮。記得 5 月 9 日那天，美國媒體都在討論廁所問題，我的微信朋友圈則都在說雷洋的離奇死亡，我那天在朋友圈感慨：中國輿論譁然於雷洋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而在大洋這邊，輿論則譁然於該上男廁，還是女廁的問題。中國的中產階級在國內面對無所不在的利維坦時，集體焦慮；美國的中產階級面對不斷擴大的「政治正確」時，也集體焦慮。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理解甚麼是「政治正確」——表面上，它似乎涉及了一些做人的準則，比如講禮貌，比較體面地處理分歧，避免使用有侮辱性的語言或行為去排斥或傷害身處劣勢或受歧視的人。

從積極的意義上說，「政治正確」是推進社會文化多元化的一種努力；從消極的意義上來看，反對「政治正確」的觀點認為它變成一種工具，以保護言論的名義抵銷另一部分人的言論自由——只要左翼人士認為那些社會意識讓人不舒服、認為言論或行為有文化敏感

之嫌就會壓制。用美國頗具爭議的保守主義者安德烈·布萊特巴特 (Andrew Breitbart) 的話說，政治正確是為了確保民主黨始終佔上風，而對不同群體採用不同規則的政治操縱。

競選期間特朗普也沒少揮動 LGBT 的彩虹旗，但當選後，特朗普立刻 180 度大轉彎，取消跨性別學生獲得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學校洗手間的權利；取消對就業歧視的保護，實施禁止跨性別者參軍服役的禁令，並在聯邦案件中表示反對同性戀權利。

對被太多的「政治正確」搞得有些消化不良的美國和美國選民來說，特朗普是治療「政治正確」的偏方，他粗鄙、充斥着排外或人身攻擊色彩的言論得到相當一部選民的支持和附和，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人們對「政治正確」的情緒反彈。

「政治正確」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奧巴馬施政不可避免的副產品，甚至奧巴馬自己也曾站出來批評「政治正確」過了頭。

比如，在政治正確的語境下，詢問一個人的伴侶，不能使用諸如「女朋友 / 男朋友」或「丈夫 / 妻子」這樣的性別詞彙，要政治正確，就要避免事先假設其性取向或性別，也不能暗示他們是否會選擇結婚，政治正確的詞應該是「partner」（搭檔）。

日常交談如此，在國家政策上也有相應政策調整。比如為幫助弱勢種族免受大眾對其臉譜化的、先入為主的偏見，讓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族裔順利入學，奧巴馬政府主動降低了非裔、拉丁裔等的大學入學門檻。

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舉措，意在促進高校的多元化，鼓勵美國高校把種族考量列入招生指導原則，平衡美國歷史上對少數族裔的歧視而帶來的社會分化。但奧巴馬政府推出的「平權法案」的結果

是，學業優秀的亞裔學生和白人反而受到了反向歧視，「擇優錄取」變成了「擇膚錄取」。

對這項以種族和膚色為基礎的政策，雖然有其道德正當性，但引發了大量的反對。

特拉華大學教授琳達·戈特弗雷德森 (Linda Gottfredson) 給我解釋說，「多樣性」如今變成了種族比例的代碼或類似的東西。它與思想的多樣性，或英才教育都無關。以前講非歧視 (non-discrimination) 原則，是指按照相同的標準對待每個人。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人們清楚地意到，非歧視原則並未產生所有種族 / 族群相同的比例，於是多樣性的說法取代了非歧視原則，宣稱多樣性本身就是對每個人都有利。因此，當種族配額的舊理由被證明是錯誤的，是種族歧視時，多樣性出來站台。這是對經濟效率徵稅。

回想起來，在美國這幾年中我唯一接觸到的華人奮起反抗的事例，就是抗議哈佛大學等常春藤盟校在招生中的「種族配額」存在種族歧視。

其實在美華人的心態基本和「抗爭」沾不上邊。相反，有人總結他們的心態是「小農心態」，逆來順受，明哲保身；「過客心態」，不把美國當成自己的家，只看中國新聞，不看美國新聞；「難民心態」，覺得美國甚麼都好，能將就就將就。

華人這次選擇奮起反抗也很好理解，為了孩子。到了美國，我聽到的最多的故事就是中國人如何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成全下一代。華人的努力見了成果，特朗普政府宣佈將會廢除奧巴馬時期留存的有關大學招生錄取的「平權法案」的指導意見，哈佛也被訴招生歧視亞裔，偏袒其他少數族裔。



在奧巴馬任期內，國內政策如此，對當時全球最危險的外交政策挑戰伊斯蘭國 (ISIS) 時也是如此。ISIS 在中東地區迅速崛起、不斷擴張，並將美國作為主要的恐怖襲擊對象。奧巴馬在不同場合指伊斯蘭國「不是伊斯蘭」，只是基地組織的「初級預備隊」。除了在認知上和戰略上的混亂和錯誤外，共和黨批評說，奧巴馬一味維持所謂「政治正確」，以致不肯說出「激進伊斯蘭」和「伊斯蘭恐怖主義」等字眼。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經濟問題在 2016 年前後對大多數特朗普的選民來講不是問題，有經濟困難的藍領白人選民更傾向於支持希拉里。就連半福利性質的奧巴馬醫改也和特朗普當選關係不大，最終決定他們選票的，是美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所謂社會的發展方向，很大一部分是指政府對社會底層、對少數族群的國家政策。一些美國選民認為民主黨不去操心大事，重點都放在「廁所」這樣的破事上；面對恐怖事件，不去操心防範於未然，重點都放在咬文嚼字上了。

以美國少數族裔裡投票率最低的華裔為例，我的朋友 Jack 給我列出了華人中產拚死推翻民主黨而選特朗普的原因包括：奧巴馬下令不遣返非法移民，希拉里揚言要大赦 1200 萬非法移民；民主黨推動全民最低收入制，即對不工作者和低收入者，政府有責任發給現金，補齊到最低收入線；奧巴馬和希拉里都要大量吸引穆斯林難民；支持黑人暴力組織 BLM，一貫在警察執法中偏袒黑人；民主黨推動在押犯人的投票權；奧巴馬要矽谷的高科技公司保證雇員人種比例符合全國人種比例等等。

回頭看民主黨競選的失敗，Jack 了解到，民主黨精英的規劃是

推動全球化的實現，創造一個產品沒有關稅，人員充分流通的世界。這讓 Jack 很吃驚，他對我說，奧巴馬在台上八年，美國社會價值觀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根本的人性很難改變。變得太急肯定要出問題。

Michael 是美國大學政治學教授，這個高大的美國人卻讓我覺得有些民國文人的氣質。他眼中的奧巴馬不是一個好的政黨領袖，沒能帶着民主黨引領國家走向未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奧巴馬一直要傳達的信息是希望美國民眾要有歷史視角，更要有信心和耐心。2012 年奧巴馬團隊發佈的競選口號是「前進」，想以此激發選民鬥志，相信在奧巴馬的領導下，美國終將會走上康莊大道。實際上四年之後，他把繼任的位子傳給了民主黨老守衛者希拉里，後者卻根本無法維繫奧巴馬建立的那個年輕的、有前瞻性的聯盟。

2018 年結束之際，由於中期選舉的勝利，民主黨有了底氣。雖然仍被內鬥消耗、但在捲土重來之後，民主黨需要強化自身力量已成為黨內共識，新一代的年輕人則因反對特朗普而走到一起，雖然讓他們為馬首是瞻的人物尚未出現，至少他們提供了革命的火種。

## 特朗普的擁躉

### (一)

我永遠記得特朗普第一次闖入我的世界的情景。

那是 2016 年初的一天下午，天氣乍暖還寒。電視開着，不過是作為背景噪音。電視中細數着美國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那年共和黨候選人人才濟濟得有些擁堵，無論是前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布殊、威斯康辛州州長斯科特·沃克、前阿肯色州州長哈克比、還是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克魯茲、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魯比奧、肯塔基州參議員保羅、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以及俄亥俄州州長卡西奇，在我看來，哪一個單挑出來都有總統相。

電視裡介紹的是地產大亨唐納德·特朗普。特朗普開始說起他的智商，讓我立刻停下手中的事，跑到電視機前。他說，“I always told people, you know I’m a very smart guy.”（「我總是告訴別人，你也知道我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一般來講，公開在電視裡誇自己聰明，就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他沒有那麼聰明。我饒有興趣地湊到電視前看這個大言不慚的聰明人，看到了特朗普的那一頭亂髮——就像從火

災中的假髮廠現場搶救出來立刻戴在頭上一樣。

特朗普出乎全世界的預料當選了。特朗普的當選估計是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學科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研究的現象，但可以確定的是，特朗普的選民之基功不可沒。

所謂特朗普的「選民之基」有多種不同的含意：可以指忠實於特朗普本人的個體；或者只是追隨反移民政策的群體、也可能是那些認同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政治觀點的人，對後二者而言，是不是特朗普無所謂；也可以指那些總體上忠實於保守的共和黨議程者；還有可能是很多其他不能一概而論的情況。

籠而統之地說，激發美國選民支持特朗普的動力是對知識分子、媒體、學者、技術官僚等所代表的精英主義意識和傲慢的怨恨——那些人總是高人一等的樣子，居高臨下藐視另一部分美國的眾生，比如——大談氣候變化試圖把控他們的生活，或者用氣候變化來侮辱鄉土社會人們的智商；奧巴馬政府總試圖用監管政策來控制他們的行為；信教群眾認為同性戀正在佔領這個國家，等等。而民主黨的政治組織薄弱，使這種怨恨成為一種力量，並佔了上風。

以美國華人為例，他們向來政治傾向寡淡。在美國少數族裔中，華裔投票率一向是最低的。但在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華人給外界的印象是異常狂熱地支持特朗普。兩年後，當我要找這些特朗普的擁躉時，一部分人回覆我說，他們的圈子裡沒有甚麼特朗普的支持者；另外一些人說，不願意談，尤其不願意外人知道他們選了特朗普，因為支持特朗普都成過街老鼠了；還有幾個在微信上回覆我說，這個問題很敏感。

我個人理解，所謂「支持特朗普很敏感」，是因為圍繞特朗普的

爭議太多。

最後大約 20% 我所聯絡的華人沒拒絕我，但提出不用其中文姓名接受採訪的條件，他們和我直接或間接接觸到的特朗普支持者類似，幾乎都不是特朗普的鐵桿粉絲（「川粉」），大多數人形容當時投票給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是「在兩個爛蘋果中選看起來稍微好點兒的那個」，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

特朗普上台一年多後，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人分裂成三個陣營：鐵桿「川粉」們對特朗普「死了都要愛」；另外一些人對特朗普失望至極，悔不當初投錯了票。在推特上專門有一個「Trump Regrets」，是這些吃後悔藥的人抱團取暖的所在。夾在兩者中間的則是那些對特朗普繼續支持，但有些微詞的人，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多在這一陣營中。

這些民眾對特朗普的微詞，集中於他像走馬燈似的換高級官員。這個現象貫穿於他的任期，有估算說平均每 17 天就有一位高級官員離職。2018 年，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對比分析列根（Ronald Reagan）、老布殊（George H. W. Bush）、克林頓（Bill Clinton）、小布殊（George W. Bush）、奧巴馬和特朗普擔任總統前兩年間白宮的流動率，得出的數字分別為 59%、17%、58%、17%、41% 和 83%，特朗普政府以 83% 而藐視群雄。被換掉的都是總統的核心班底：從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白宮辦公廳主任、白宮新聞秘書、白宮首席戰略師、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直至聯邦調查局長、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環保署長、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等。

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對特朗普更多的是讚賞和仰慕。比如特朗普競選時說要重新談判貿易協定、收緊移民政策、加大國防投入，

進行稅制改革，都在一一兌現，認為他比歷屆總統都實幹，雖然阻力重重，但他盡最大的努力兌現他的競選承諾。

其中一個特朗普的支持者這樣向我分析他們的群體：美國經濟對大多數大陸移民來講不是問題，他們大多生活殷實，就連半福利性質的奧巴馬醫改也和他們關係不大，所以最終決定大陸移民選票的，是美國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

即使中美貿易紛爭不斷，對抗頻繁升級，支持他的華人也不覺得有何不妥。他們指出，這次爭端並非特朗普個人一意孤行。以前每次中美貿易爭端，共和黨溫和派和商業團體都會出來為中國遊說，但這次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為甚麼？美國上上下下觀點比較統一，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對中國做點甚麼，唯一可能有分歧的地方是在手段上應當有多激進。

對於中美貿易戰帶來的成本，他們認為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某些東西會漲價。不過，一個美國賓州的中國大陸移民就對我信誓旦旦地說，「我寧可多付 30% 買進口產品，也不願意多付 30% 的稅去養活那些因為不公平競爭失業的美國工人。大量人失業後帶來的問題不僅僅是金融上的。」

所謂的不公平，在這些支持特朗普的擁躉們看來主要是兩條：一是中國大陸靠大市場逼迫美國企業做技術轉讓，二是中國對國企重點扶持，貸款支持充足。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參加過一些支持特朗普競選的活動。他說，表面上看特朗普是發難的一方，但如果看過去十幾年雙方貿易的情況，問題在中國，美國容忍了不公平的貿易，家大業大嘛。現在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以前那些便宜就得收回。

德州的華人醫生 David 是特朗普支持者中相對平和的一個。他的觀點是，目前特朗普政府起碼沒在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上刁難中國，否則損害會更大。

有一篇文章提到，華人既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同時又是一個對種族歧視不會感到特別不適的群體。在美國，很多遵紀守法的華人成為某些非洲裔和西裔毒品、暴力和騷亂的受害者，他們對美國政界維護非洲裔、西裔和中東裔利益的政治正確感到厭煩，因此期待一個對政治正確缺乏興趣的政治強人來改變現狀。該文最後指出：「你甚至可以說，他們所期待的幸福，就是別的民族的不幸福。」

這個對政治正確缺乏興趣的強人適時出現了，他就是特朗普。

Tina 生活在弗吉尼亞，在她眼裡，特朗普形象不太好，沒有政治經驗，醜聞一大堆，但她堅信「缺點很明顯的人反而不會做特別的壞事」。和很多苦學多年才通過留學從大陸到美國的華人一樣，Tina 的政治訴求是移民政策改革。

特朗普一直以來就非法移民問題「喊話」鄰居墨西哥，派 5600 名軍人和另外 2100 名國民警衛隊員進入美國邊境地區協助打擊非法移民活動。Tina 對在墨西哥邊境建牆不關心，也不認為移民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但她認為美國移民魚龍混雜，甚至非法移民變成了被同情的弱者，她無法接受這樣「黑白顛倒」的現實。

和中國相關的事實是，隨着中國科技加速前進，特朗普政府針對華人高科技人才向中國的流動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推出了限制中國留學生的嚴格政策；隨後推進了一項旨在提高移民質量並減少綠卡發放的移民政策；隨後跟進的現實更陰鬱而怪誕，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在各高校加強了對研究實踐的審查，美國執法部門和情

報部門決心打擊非法轉讓知識產權給外國競爭對手的行為，為此他們鼓勵美國學界和行政人員制定更為嚴苛的條例來監視外國學生和訪問學者，尤其是中國學生。針對中國學生和華裔學者的恐懼和不信任在特朗普任上如盤旋在美國上空的大氣環流，它引發的擔憂長久不散。

2019 年夏初我到亞特蘭大出差，那裡的埃默里大學正處在風暴的中心。5 月底，埃默里大學醫學院以未充分公開來自國外的研究經費以及在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工作的範圍為由，解雇了華人教授李曉江和李世華，李曉江的實驗室也被解散。埃默里大學只有不到 30 名華人教授，那時已有數名離開或打算離開。

李曉江和李世華在治療一種名為「亨廷頓舞蹈症」的遺傳性疾病上取得基因編輯技術的重要進展。除了個人在科研領域奮鬥成頂尖學者外，他們研究的象徵意義在於，它成科學全球化的典範。全球化受挫，他們也陰差陽錯成為受挫的一分子。

在亞特蘭大的幾天，同中國有關係的學生、科學家受到歧視的例子當地人給我講了很多。其中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中國留學生那時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屬的 12 個地區聯儲銀行中的亞特蘭大聯儲實習，但由於她的中國身份，亞特蘭大聯儲限制她接觸一些具體數據，導致她寫論文困難重重。比如，中國某大學進行海外校友聯誼活動，也由於「時間敏感」被美方取消。中國留學生簽證受限、拖延的現象在這個大背景下幾乎都是小事一樁。

不過支持特朗普的華人認為，他們已是美國公民，只要奉公守法的就不會有問題。

我不太理解的是，就算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給華人帶來的都



是利好，但以貿易爭端為例，若雙方無法解決分歧，中國和美國企業各自從對方市場獲得利益的格局就會打破，雙方都可能承受巨大損失，華人為甚麼不擔心呢？

Jack 以自己的經歷從側面解釋了他的心路歷程：他所在的非營利的科技信息機構每年以向會員收取 100 美元左右的年費及通過部分項目付費的方式掙錢。該機構華人佔很大的比重，他們發現經常會有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於是通過外交途徑討要說法，但最終卻不了了之。

這一非營利機構的相當一部分客戶來自中國，中國是他們很大的一個市場。但中國客戶抱怨說，由於存在網絡防火牆，訪問他們網站並不容易。於是他們想了個辦法，在防火牆裡建一個鏡像，方便中國大陸客戶訪問，但由於是美國的機構，他們被各種繁雜手續弄得精疲力盡，最後也放棄了。Jack 說，「我們每次開會一提到中國都頭疼。」

Toni 是一家投資公司的創始人，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對我說，特朗普的方式方法很直接。在貿易方面，貿易逆差要應對，他的想法可能是對的，但方式太直接了、攻擊性太強了。在 Toni 看來，2017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 5600 億美元，但僅向中國出口了 1300 億美元，存在明顯失衡。如果中國能保住這 5600 億美元的對美出口，再對美國擴大市場的開放，就會減少貿易逆差。

在經濟學家眼裡，要減少 1000 億美元貿易逆差，在現有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代工廠結構下，在經濟行為上短期內是不能夠實現的。首先美國人拿甚麼跟中國交換，高端源代碼是不可能的，難道靠大豆、牛肉縮小逆差？

大豆代表着美國最敏感的農業問題。2017 年，美國大豆的出口量總計為 5313 萬噸，其中對華出口量達 3286 萬噸，佔大豆總出口量比例高達 62%。大豆出口額佔美國對華出口額比例為 11%，佔對華出口農產品金額比例為 58%。大豆出口對美國農產品貿易舉足輕重，特朗普獲選總統不只是華人的力挺，而是那些盛產大豆的搖擺州倒向了他。

所以當中國狠下心來動特朗普的農業票倉時，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國農民壓力很大，部分人公開表示不確定是否會繼續支持特朗普，這引起了一些特朗普華人支持者的憤怒。對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來說，這是公事私辦。有人發給我的一條頗有代表性的評論這樣說，「我的直覺感覺，這就像商業競爭者之間做掉對方家裡人一樣，比通常的不專業還下作。」

至於特朗普拿中國的航天、信息等開刀，他們的反駁是，特朗普是商人，他喊出了甚麼不一定會真做甚麼，這是一種策略。

Toni 在洛杉磯，他認為中國應該開放科技市場，讓 BAT 等與美國的 GAFA（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四家公司的首字母縮寫）等對峙，他說，「不要因為怕打不過而去封閉市場，說不定中國的企業很有競爭力」。劉煜輝的建議則是，有條件地開放數字和服務貿易市場即互聯網。他說，實際上美國想要的是中國巨大的互聯網經濟，14 億人有效地連接在一起，人和人連接、人和物連接、物和物連接。5G 的升級，在國家力量支持下，中國人在這個方向上領先歐美半個身位，所以美國進入不了這個市場會很吃虧。

貿易逆差只是一個問題。David 代表的是另一個類型的華人選民，他們做很多中美交流的事情，當初正是考慮到希拉里對中國不

友好，擔心她上台後對中國會用更極端的手段，所以在沒有更多選項的前提下，票投給了特朗普。

David 堅信特朗普是靈活的商人，商人有利益方面的需求，而特朗普最看重的是經濟利益，換句話說，一切都是生意，都是掙錢，這對中國並不都是壞事。

## (二)

2017 年 11 月底，感恩節，作為外鄉人的我收到朋友邀請去她弗吉尼亞的家裡赴宴。朋友溫婉優雅，是傳統的美國女性，因此我設想迎接我的將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和一個典型的感恩節之夜。在接我去她家的路上，朋友簡短的幾句話顛覆了我所有的想像：她離異，女兒新婚不久，是同性戀；大兒子在做變性手術，小兒子在找工作。

在朋友家「愛和感激」的感恩節氛圍中，大家聊得開心，我無意間一個笑話說到了特朗普，餐桌氣氛立刻大變，大家紛紛找藉口離席。後來我被拉到一邊說，朋友的小兒子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其他人都反對特朗普，所以任何關於特朗普的話題都會讓家庭成員的情緒對立起來。

得知朋友的小兒子狂熱支持特朗普後，我特意留心觀察他。23 歲本該是朝氣勃勃的年齡，他的肩膀卻無精打採地垂着，感覺空氣也隨着他下耷的肩變得沉重。他沉默寡言，一晚上沒說過幾句話。從聊天的隻言片語中，我拼湊出他的生活：社區大學沒念完就輟學了，工作也隔三岔五的換，生活不穩定帶來的拮据讓他的笑容總有一絲尷尬。感恩節那天晚上，他帶來一大袋子的髒衣服，好趁機用

一下我這位朋友的洗衣機。

他去洗衣服時，朋友的家人迅速地給我補了一課，特朗普沒有甚麼特別的政策吸引朋友的小兒子，但前者身上表現出的超級大男子主義，無論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對競爭對手的不屑、還是他四處炫耀的支配慾，對於朋友的小兒子這種剛進入社會、迷茫於尋找自己人生目標和社會定位的人來說，代表着一種可能，一種力量。

奧巴馬在位八年，正是以我這位朋友的小兒子為代表的美國年輕人政治意識培養和樹立起來後，進入社會、成家立業之際。這八年也是兩黨僵局、運轉失靈和政府關門如影隨形的八年。到了奧巴馬執政後期，更有國稅局 (I.R.S.) 醜聞、班加西事件，克林頓基金會「斂財」醜聞、希拉里「郵件門」等等，各種醜聞疊加，令白人選民對政客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美國政客的形象在一部分人心中轟然崩塌。

在美國公眾眼中，國稅局是聯邦政府最大權在握的部門。國稅局針對茶黨等保守派團體進行「更嚴格稅務豁免檢查」，以公民的政治觀點為核定稽查目標的依據，公器私用，把政府的權力與打壓政治對手的工具混為一談；國稅局醜聞外，又有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遭長達 8 小時的圍攻、大使命喪黃泉，奧巴馬政府坐視不救，事後又遲遲不承認恐怖襲擊的種種不堪；更擊中選民要害的是，光彩照人的希拉里在擔任國務卿期間，未獲允許便利用私人郵箱處理公務，也未在卸任前提交所有處理國務院事務的電郵、未能遵守《聯邦檔案法》。

希拉里在聯邦調查的陰影下投入競選。此前她一度被人稱為政壇席琳狄翁 (Celine Dion)，後者是多屆葛萊美「最受歡迎女歌手」，

希拉里是全球知名的女政治家，廣受藍領和女性選民的擁戴；她們都有狂熱的追隨者，喜歡希拉里的人認為她智慧卓越、性格堅毅，但輕慢和「捨我其誰」的態度讓她的總統夢在 2008 年破碎；2016 年，選民嚴重質疑她的個人誠信，讓她的總統夢萬劫不復。

從未涉足政壇的特朗普此時適時出現，應和了不滿的情緒，並填補了政治真空。美國的總統大選，實際上是選民對無形的期望進行投票。特朗普君臨天下，帶來了憑他一己之力推翻華盛頓建制派的可能性，給這些失落的人以希望，他們重燃信念，但與其說他們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不如說支持特立獨行的特朗普。

在美國的大學生中間，特朗普支持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弱勢群體」——他們數量極小，支持特朗普意味着他們要麼被看作是種族主義者，要麼被認為沒有大腦思考、弱智，要麼像特朗普一樣是個渣男……這讓他們挺身而出表達支持特朗普需要極大的勇氣，等待他們的很可能是奚落和敵意。

2016 年大選一周年後，《華盛頓郵報》在 2017 年底做了一份調查發現，美國白人中有 41% 的千禧一代投票支持特朗普。美國對「千禧一代」沒有嚴格的年齡界定，基本上指 1980 年代到 2000 年間出生的群體。千禧一代有 8300 萬人左右，是美國最具種族和族裔多樣性的一代，也是人數最多的群體。在政治意義上，達到合法選舉年齡的美國千禧一代在人數上接近嬰兒潮一代。這些都使千禧一代的政治選擇變得舉足輕重。

美國青年選民在 2008 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功不可沒，他們的政治力量日益壯大。但在美國分化的社會中，千禧一代的政治價值觀和力量也有明顯的分野。